

跨文化主义的范式变化*

〔比〕巴得胜 撰** 董晓萍 译

摘要：在欧洲，“跨文化”的概念、知识和学科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，经历过构建欧洲中心主义和非欧洲中心论的漫长过程，涉及对“科学”“哲学”和“智慧”等概念的深层讨论，还有得自人文主义、文艺复兴运动、资本主义、工业革命等影响，最后形成。与此相对，20世纪百余年来的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，一直都在两条腿走路，一是向先进的欧洲学习，一是探索中国道路。在当代中国开展跨文化学的学科建设，有欧洲学术的影响，也有中国学界利用自身文化优势向世界前沿学术挑战的新价值。

关键词：跨文化主义 跨文化学 研究范式 欧洲 中国

欧洲的文化学属于人类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，当时欧洲向亚洲和非洲扩张，作为一种扩张的结果，欧洲知识和科学得到了发展。知识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，其中比较重要的，是为两个概念的产生了奠定了基础：一个是“跨文化主义（interculturalism）”，一是“跨文化学（intercultural studies）”。

在欧洲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之前，在中世纪，基督教等宗教势力

*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跨文化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”阶段性成果，项目批准号：19JJD7500003。

** 作者应我国科技部高端外国专家项目“跨文化中国学教育”（项目批准号：G20190001519）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跨文化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”（项目批准号：19JJD7500003）的邀请，于2019年8月来到北京，为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授课，课后作者对这次讲义做了较大的补充修改，并完成了专著《跨文化主义的范式变化和跨文化的方法》。本文是该专著的《导言》部分，该专著将于2020年内出版。——译者注

是占统治地位，其权威学问是“神学”。按“神学”的观点，世界上有“哲学”和“心智”两种学问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。“哲学”是具有严密体系的理论，只有欧洲才有。在欧洲以外的世界里，各国本土宗教文化，但不是“哲学”，没有理论。那些非欧洲国家也有“心智”活动，但只能被界定为“智慧（wisdom）”。在欧洲19世纪的对外扩张中，还有一种迅速膨胀的概念为“（世界）宗教（[world] religions）”。按照我的理解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“哲学”、“智慧”和“（世界）宗教”，是欧洲中心论的三个界定词，也是欧洲世界认识非欧洲世界的三个理论化的工具词。总之，是用“哲学”、“智慧”和“（世界）宗教”三者衡量。其中的心智活动（智慧），从广义上说，被认为是人类尝试解释自然界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活动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它决定了这一类的文化形态，也决定了对这类文化的感知方式和研究格局。19世纪以来，世界历史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但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一直存在。它塑造了欧洲哲学和宗教学等学问，也对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影响。欧洲学者在对非欧洲国家的政治科学、政治哲学、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上，也都沿袭这种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跨文化学的研究范式。

对于亚洲（和非洲）文化而言，欧洲19世纪发达的经济和军事，体现了欧洲现代性（modernity）的优越之处，他们从欧洲经验中得到启示，纷纷学习欧洲，对自我文化加以改进。史书美（Shih, Shu-mei）曾指出，在后来西方世界的发展中，也有一种“不对称的世界主义”。作者认为：

使用“世界主义”概念的各方并不对等，因为这要取决于所涉及的主体的地位。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使用这个概念时，已意味着他们每个人具备理解广泛的世界知识（读：西方）；但反躬自问，对西方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，对西方以外的世界却几乎一

无所知^①。

也许非洲和亚洲的文化最初是以19世纪欧洲社会的模式改造自我文化，但是，在反殖民化之后，亚非国家越来越多地是讲自己的文化。当代欧洲世界还看到亚非国家在经济、政治和文化上的日益崛起，所以，跨文化和跨文化学的研究范式都在发生不容忽视的变化。这种变化的特征，曾被杜克·埃灵顿（Duke Ellington）一语中的。他做过一张唱片专辑，名为《非洲—欧亚大陆》，在他身后1975年发行。在这个唱片中，有一段谈到“中国风”：

去年，我们首次推出了一套新专辑，叫《非洲—欧亚大陆》，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是受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马歇尔·麦克卢汉（Marshall McLuhan）先生的演讲的启发^②。马歇尔·麦克卢汉在讲演中说，这个世界正在转向东方，没有哪位他或她，能够驻留在以往的认同中一成不变，其实连东方人自己也如此。是的，我们经常环游世界，在过去的五六年里，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实。……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在这个专辑中，我们调整了视角，以接地气，否则就会被甩掉。现在任何人都无法确定到底谁影响了谁？^③

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，20世纪和21世纪的“跨文化”与“跨文化学”的概念，与19世纪相比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区别。研究范式的变化的结果，带动其他文化也相应地改变研究方法，不再采用以19世纪

① Shih, Shu-mei, *The Lure of the Modern,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, 1917-1937* (Berkeley/Los Angeles/Lond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1), p. 97.

② Marshall McLuhan, was a Canadian philosopher and scientist.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concept “global village”.

③ Duke Ellington, “*The Afro-Eurasian Eclipse*”, Fantasy Records, 1975, OJCCD-645-2 (F-9498), Recorded in 1971 and released on the Fantasy label in 1975, Text in Giddins, 1998, p. 499.

欧洲经济学和科学为模板的做法。19世纪欧洲话语占主导地位“谈论”其他文化的态度，逐渐让位于“与他者文化交谈”和从“他者文化内部”了解他者文化的态度。

在欧洲与外部世界的国际关系上，原来的单边主流倾向也在改变。一位出生于法国的美国文化史学专家雅克·巴尊（Jacques Barzun）说：

从他者的角度观察自己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少见的、却十分有价值的礼物。但在国际关系中，实际上，能从他者看他者的做法，仍然不多^①。

著名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（Joseph Needham）早就提出过这种观点。他在1955出任英中友好协会主席的一次开幕式上，发表了题为《东西方对话》的讲话，他谈到：

三千年来，在传统世界的两端，一直存在着某种对话，双方相互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也彼此奉献了十分不同的文化。现在，我们已有足够的理由去思考，这个世界存在着纷繁复杂的问题，但未必都用欧洲人的观念去解决。我们还要用更为宏观的人类视野，去看待这个世界，也用欧洲以外的观点去观察自身的欧洲史，思考欧洲的成败得失。由此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亚洲人民（当然也还要加上非洲人民）业已取得的成就，其实并不亚于欧洲^②。

关于跨文化和跨文化学研究范式的重大变化，我将在本书后面的

① Jacques Barzun, "The Man in the American Mask", *Foreign Affairs*, 1965, 43(3), p.426.

② Joseph Needham, "The Dialogue of East and West", *Within the Four Seas, The Dialogue of East and West* (London: George Allen & Unwin Ltd., 1969), p.11.

几章中充分讨论，在这里，我先主要讨论这种文化的和方法论的概念在中国的发展。对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而言，这种学术建设，对他们看待中华帝国周边他者的文化，也会产生影响。

本书在后面的几章中，将简要勾勒欧洲知识系统的发展史。在相关专题的讨论中，会转向欧洲人文主义、文艺复兴运动、资本主义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，讨论它们作为背景，对于跨文化学的学科史所起的作用。我还将指出欧洲经济和军事优势与中国的对峙，而中国却在两条腿走路，一条是欧洲启示中国的道路，一条是中国自己的道路。当前中国知识界正在这一方向上尝试接受未知的挑战。

在本书的最后，将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跨文化学的作用，及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展开分析。书末，我将就中国崛起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，及其给跨文化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愿景，进行讨论。